

流浪的追梦路上

张逸良

当左小祖咒所作的片尾曲缓缓奏响,四周灯光渐渐变亮,放映厅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——3月24日,博洛尼亚电影中心红厅,影视制作人、导演郑浩拍摄的纪录片《无界》首度对外公映。七十多分钟的影片,生动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张大力三十年来的艺术创作轨迹,并且由个体的记忆,延伸到对艺术生态的观察与反思。

坐在放映厅中的我,透过《无界》,第一次看到那些在展厅里陈列的作品的成型经过,了解到那些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故事,进而对张大力有了更为感性而全面的认知。作为张大力二十多年的老友,郑浩通过镜头语言,呈现出许多用文字无法描述的内容,这些内容,是张大力的“秘密”,也只有对张大力十分了解的人才能感受得到。

两年前,也是此时,我曾到访张大力在黑桥艺术区的工作室,那时他正在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那场以“恒久与无常”为主题的展览而紧张忙碌。我们的对话围绕“恒久”与“无常”这两者的关系展开,不仅局限于艺术这个宏大的命题,还聚焦于张大力经历的不同创作阶段。两年后,我和张大力对话的地点改在了意大利博洛尼亚,在展厅中一场并无太多问答的闲聊,毕竟作品本身,就已作了回答——3月23日开始,一场以“变化”为主题的回顾展在法瓦美术馆举行,九个区域,超过二百件作品,创作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当下,张大力三十年的艺术创作经历在这里徐徐展开,而这,也是法瓦美术馆第一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。

近三十年前,张大力从北京来到博洛尼亚。在此之前,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装帧艺术系的他放弃步入常人眼中“正常生活轨道”的机会,选择成为一名自由画家。那个年代职业画家的境遇,几乎可以用“流浪”来形容——没有户口、没有正式工作,租住在狭小而破旧的平房里,饿到能听见自己的胃在“说话”……但他们却谈着理想中的艺术与生活,拥有自己支配自己的绝对自由。纪录片《流浪北京》,第一次记录下当时那个二十多岁的张大力,满含纯粹、自由的理想主义,以及追求“真正艺术”的真挚与狂热。那时张大力一直致力于抽象水墨的探索,在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的诸多流派的基础上融入了佛教、禅宗和道教思想,特别是1987年8月至11月的西藏之行期间,他创作了《人间》等一批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水墨画,成为他早期艺术的代表。可当置身异国他乡,这条创作之路只得戛然而止——

失去了水墨创作土壤的孕育,使得每一步前行都很艰难,而且当时弥漫在意大利、甚至是整个欧洲的艺术生态,都是去探索当代艺术,古典与传统,更应该出现在博物馆、研究室和教科书当中。正是因为环境的改变,促使张大力重新摸索自己的创作,他将观察的视角回归到现实和人,探讨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关系,思考生命独立与生存本身的价值——这是艺术创作的动因,也是当代艺术存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。

这种摸索,注定艰辛而挣扎,毕竟张大力需要打破之前自己对艺术的大部分成见。不再是水墨,也不再是封闭空间内的单纯想象,他需要走出屋子,观察现实世界。不久后,张大力找到了“街头涂鸦”——这种带有鲜明个性与主张的有力表达方式。

二十四年前,张大力出现在郑浩的镜头前,身处博洛尼亚街头,背后是他



▲《广场9》雕塑(玻璃钢) 2014年



▲《车夫》(纯棉布蓝晒) 2011年

▲《人间》(水墨纸本) 1987年

的涂鸦。那时的他,目光坚定而犀利。迥异的环境比对,让张大力对当代艺术有了更明晰的认知,也让他看到另一种可能:几年后,当他重回北京,看到因城市化改造留下的各处废墟时,在上面用黑线勾出一个侧脸、光头、厚嘴唇、高额头的“人头”——有意无意间,他把“涂鸦”这种新奇的艺术带到了中国,成为“中国涂鸦第一人”。这个“人头”形象,成为张大力艺术创作中最经典的代表;而由这个“人头”延伸出来的“对话与拆”系列作品,使得张大力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光与影总是相伴而生,很多艺术家在此时都会面对一个困境:一旦自己某个主题的创作太过经典,或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,那么他接下来的创作就会变得异常艰难,以至于很难翻越自己这座山峰。张大力也不例外。每当经历创作低谷,脑力和心力有枯竭感时,张大力都在试图用“阅读”的方式来寻找下一个能攀登的山峰。这种“阅读”,包括最平常的读书,也包括感知目中所及的周遭。王阳明对张大力的影响很深,为他的艺术提供了明晰的指向,“世间一切的问题,简而言之都是心的问题。只有当内心有了明确的目标后,目标才会成为内心的一种存在,进而人才能主动进行创造。那些被动的、与内心意志相违背的行为,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艺术。”

正因如此,在创作了“对话与拆”后,张大力一直都在宏观命题下寻找微观的视角,进而有了“一百个中国人”、“种族”、“永恒”等主题的人物雕塑创作,以此记录下很多微小、普通的生命个体的状态,反映出深刻而值得思考的现实。虽然这些年来,张大力的艺术表现的主题和形式一直都在变化,但他艺术创作的初衷未曾改变,传递的精神也是一以贯之。这些生命个体瞬间的状

态,因为雕塑的形式得以凝固、成为永恒,亦成为观者回溯历史、窥探时间的一扇窗口。当然,这样前卫而大胆的表达,正如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一般,始终存在质疑与讨论。

二十多年转瞬即逝,年龄增长、阅历渐多,张大力也在经历艺术观念的巨大转变,伴随对自己创作历程的不断反思。他不再坚持当代艺术与传统势不两立这个观点,认为所谓的“反传统”,应当建立在对传统十分了解的基础之上。而在过去,“反传统”更像是个口号,或者是个主张,并无实质效用。中国古典美学观念和结构,得以逐渐进入到他的作品中,而他对艺术概念的界定,也因“蓝晒”、“汉白玉雕塑”等主题创作得到了扩展——艺术家完全可以借助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,来使之服务于艺术,以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主张或内容,而非单纯依靠艺术家自己拥有的那些技能,“艺术本身其实没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自己的思考方式。”

张大力的艺术创作经历,是那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时代变革中探索与挣扎的缩影,即由构建梦想,到艰难圆梦,再到构建新梦想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不断打破已有的认知,打破艺术的有形边界,实现自我的新的抵达。

纪录片《无界》结尾,张大力说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:“如果说从三十年前我开始做梦,实际到现在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,我仍‘在路上’,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。我认为一个人的梦想是不可能百分百实现的,如果梦想都实现了,他的存在也就没了意义。那么,流浪是什么?流浪就是没有固定的地方,没有约束,能自己控制自己。流浪是我当时的梦想,我觉得现在我的精神还处于流浪的状态中。”

而这,或许就是张大力对自己三十年艺术创作生涯所作的精彩诠释。

狐仙小传

白杏珏

谈及狐狸,首先想到的词总是“狡猾”——这种自带三分魅气的动物以“多疑”著称,由此有了“狐疑”一词。狐性多疑的说法来自于“听冰渡河”这个典故: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,狐狸在河面结冰时渡河,会先俯身细听冰下的水流声,以确定冰面的厚度是否安全。而狐狸开启成仙之路,与《山海经》中的一段记载有关:在青丘国,有一种天赋异禀的“九尾狐”,这一神兽在后来成为了西王母的侍从。

与其他凭借蛮力获得地位的动物不同,狡猾多智的狐狸向来“以智服人”。从西汉到魏晋,道教的兴盛不仅加速了狐狸成仙的步伐,甚至让它们识字习文,成为风度翩翩的“书生狐”。《搜神记》中就有一则以西晋名臣张华为原型的精彩故事:一只斑狐化作书生拜访张华,张华对其过人的才智产生怀疑,取了千年华表木来燃烧,最终照出书生的原形并且降服狐妖。这个故事中的狐妖以“总角风流”的书生形象示人,谈吐风雅,其形态、举止、思维方式全然是以文人为模板复制的。而学识最广、道行最深的书生狐被称为“胡博士”,“胡博士”在深山里开馆收徒,教化众生,算得上是“桃李遍青山”了。

唐初有谚云:“无狐魅,不成村。”唐朝初期,狐仙信仰早已遍布村镇,尤其是狐狸行踪最为活跃的华北地区。以北京城为例,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周边地区仍有狐仙信仰的痕迹,且为“四大门”(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长虫)信仰体系的核心。根据李慰祖的研究,北京地区的“四大门”又被称为“财神爷”,主要庇护农民的经济生产及家庭事务,而“狐门”在“四大门”中地位最高——乡民认为狐仙走路安然稳步,从不回避行人,施施然有仙人之相。在清代部分地区的狐仙画像中,狐仙完全是成年男子的模样,被众多侍从簇拥着,俨然是仪表堂堂的“胡太爷”。

从魏晋时期的“胡博士”,到明清时期的“胡太爷”,狐仙似乎总是以文人官僚的形象出现,而不像人们惯常以为的美貌女子。清代是志怪笔记发展的又一高峰,文人以交流记录狐鬼怪谈为乐,而狐仙绝对是这些传说的主角。清代志怪笔记的扛鼎之作《聊斋志异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都记述了大量狐事,蒲松龄以才情之笔书写了狐仙与人的情义纠葛,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则将狐仙的智慧与德性描绘得趣味盎然。在这些奇幻的故事里,狐仙世界也是百态丛生,有以美色惑人者,有以才学服人者。此外狐狸要修炼成仙,不外乎走正邪两条路:要么如书生苦熬科考,踏实修炼直至平步青云;要么投机取巧,吸取精气速得道行。不论哪条路,似乎也是大部分文人官僚的人生写照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士人在畅谈狐事之余,还发展出一种专属的狐仙信仰分支——守印大仙。“守印大仙”指的是保守官印的狐仙,设于官府内,以保佑当地官员仕途通达。拜祭狐仙的处所被称为“大仙楼”,一般设有狐仙的牌位或画像。在现存的明清府衙遗迹中,有数处府衙署有可考的大仙楼遗迹,如山西平遥县署、吉林宾州府衙、台湾县署等。以保存最为完整的山西平遥县衙为例,县衙内部所祭祀的神明有土地神、马王及狐仙等,土地祠在县衙东南端,与戏台合成院落,大仙楼位于县衙最深处、内宅之后,具有很强的私密性。该楼底层为餐厅,二层面阔三间,供奉着狐仙的牌位。当地传说记载狐仙曾帮助平遥县尹找回丢失的官印,此后清代的历任平遥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,在每月初一、十五日都会亲自登楼焚香祭拜。闽南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祭拜传统。由此可见,“守印大仙”是一种辐射范围极广的官僚信仰。除官印外,清代钱泳所著笔记《履园丛话》中还有狐仙守护藩库的记载,足见狐仙与官僚系统的密切关系。

论及狐狸,人们通常以貌取“狐”,只因那张下巴尖尖、眉眼弯弯的脸,就给狐狸扣上妖媚惑人的罪名。但其实那些勤勉好学、人情练达、最终成为士人保护神的狐仙,才更值得人们的关注。